

访谈录|书评

◀ (上接7版)

国自身的历史渊源对当前经济发展的贡献常常被忽略。

我将商品化看作是帝国晚期基本的经济文化属性,主要研究契约在商品环境中的作用。我关注契约以及其他交易文件,试图解释它们不仅在社会和经济活动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而且在社会繁衍过程中也意义非凡。试图以人类学视角,通过关注帝国晚期普通人处理实际事务的能力和实际,来展现中国传统的另一面向。这和前期的研究一起,有力地证明了中国现代性深深地植根于其自身的传统之中。

李明洁: 现代性是中国传统内在的经验,这真是一个非常特别和重要的结论。如果将这一论述纳入我们的自觉意识,自然可以开放出一种新的想象视野,即中国可以积极地介入现代世界规则的共建,这是民族传统的自我实现而不再是自我异化。您能具体谈谈您的论据吗?

孔迈隆: 我将注意力集中在台湾美浓地区清朝后期经济文化中重要方面的一些文件,它们促成了一些重大交易,使之合法化,并提供证据。其中大多数是被保存下来的契约,长期以来它们被认为是“现代性”的重要

指标,与基于“地位”的“传统”和“落后”的经济关系是不一样的。尽管契约在清朝后期的社会与经济生活中事实上是广泛存在的,它们的重要性直至最近就算没被全盘否定也是被大大地低估了。这是受现代的反传统主义的影响,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落后的、封建的,所以不会广泛使用契约这样的现代性符号并以其为特征。

实际上,在当时,土地通常可以买卖和抵押,书面和口头契约在农村生活中有重要的作用。家庭和农场在资源允许的范围内,具有明显的企业家精神和市场导向。契约甚至进入亲密的家庭关系中来处理冲突,如分家中的财产分割等。契约的使用远远超出了土地、房产交易和商业等领域,合同涉及的事项包括分家、某些类型的婚姻和收养关系、设立各种以祭祀神灵和祖先为目的的股份制协会、人口买卖和使役等。但并非所有的文件都是契约,有的是誓词,有的是财产分配的证人证言。交易文件的修订也很常见。

这些文件促进了包括血统、社区和教区等社会关系的动员,交易的当事人和诸如中间人、证人等参与者通过这种联系,促成了文件相关交易的达成。由于大多数与土地相关的合同都是“白色(未登记)”的,只有一小部分是在政府登

记过的“红色”合同,这种联系的重要性就变得格外突出。可见,选择契约行为的倾向,是晚清帝国经济文化的一个基本属性。毫无疑问,这种经济文化对当代中国而言是显著而重要的遗产之一。

李明洁: 明清以降的契约类地方民间历史文献与地权结构、人口变迁、产业发展以及社会组织、宗族、宗教等有着直接关联,近年来受到社会经济史和社会史等历史学界的广泛关注。与单纯的历史学或者人类学研究相比较,您的历史人类学研究方法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孔迈隆: 历史人类学是将人类学的概念应用到文献资料的分析中,而这些资料是通过民族志的田野调查获得的。历史人类学并不是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进行的。清朝时人们并没有考虑到书面文件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这反而使得历史人类学在中国具有潜在的优势。不幸的是,中国近几个世纪的历史动荡,使得像地契、分家协议、寺庙记录、家谱和协会账簿等不能完整地保存下来,它们也未必能够提供完整而有效的基础材料来详细验证社会关系和文化模式在一个地区的形成。

谱系研究的历史维度往

往来源于被访者的口头报告,来自当地文献资源的支持相对较少。但是,历史人类学并不是档案研究的最初产物,因为它需要在一个特定地区进行长期的田野工作,同时又有充足的档案材料。实际上,很多先辈的档案还在当地后人的手中,从事田野调查的人类学家必须通过借阅、复制、归还等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获得文件。这就使得仅仅是创建档案就需要大量的田野工作,在与田野调查的民族志结论发生关联之时,这些档案将呈现出更大的价值。这样的历史人类学,将能为通过民族志研究来识别和描述的亲密社会关系的形成过程,提供文献的依据。

李明洁: 既然如您所说,晚清中国已经发展出了高度的前现代的商品经济,那为什么中国并没有平稳顺利地过渡到现代化的进程呢?

孔迈隆: 晚清遗产的一个重要方面表现在中国老百姓在文化和经济上所体现出来的复杂性。普通人在农业和非农业管理和技术领域的水平都超过知识精英,控制着家庭、社区以及更大的社会网络。在高度商业化的帝国后期,能很好地理解、面对并操作货币、信用、合同和其他经

济手段。这样的水准和技能极大地影响到中国现代化的变革进程。

文化的复杂性表现在:作为社会运营单位的组织和机构,会与主流的意识形态互动。中国的机构从来不是单单依靠传统的力量来维持运转的,它还要依靠领导人、管理者和社会活动家来维持其延续性。一方面,诸如家庭、血统、宗教组织和地方政府等实体机构会按照普遍接受的社会、宗教、经济和信仰等规则组织起来;但另一方面,管理层和领导者又会常常决定这些群体的形态、繁荣程度甚至存亡。

李明洁: 您针对汉人社会的传统进行人类学研究,不仅指出了汉族人家庭制度和社会系统的特殊传统;而且通过对契约的原创性探索,揭示出中国文化传统中原本具有,但因各种历史和现实因素而被遮蔽了的复杂的现代性。中国的现代化并非要丧失自身的传统而走向“西方化”,而维护民族传统也并不意味着要抵御西方走向“反传统”的道路。中国在全面介入现代世界的当下,如何挖掘并保持自身的“中国性”,并在更深刻的意义上实现民族精神?您的研究是警示性的,更是启发性的。

吴语研究为什么重要

——读《步随流水赴前溪》

朱林兴

褚半农先生以乡土散文而著名,其实,他还是一个著名的吴语研究专家和方志专家。由复旦大学出版社推出的《步随流水赴前溪》(2016.10)一书,是褚先生30多年来对有关吴语等问题的研究成果的结集。

褚先生虽不是科班出身,但凭借深厚的理论功底和丰硕成果奠定了他在吴语研究领域中的重要地位。诚如叶辛所说:“一百年之后,现在报刊上的文章和小说散文可能被人遗忘,但是,半农的《莘庄方言》还是会有人感兴趣,仍会有它的价值。”(见本书序)

作者引用宋人李弥逊《云门道中晚步》一诗中的“步随流水赴前溪”作为本书题目。从中就可知他写此书时,尤如溪边散步,自由自在,又是那样深思熟虑,精研细琢。

褚先生这部著作的价值可以概括为六个字:释难、纠误和拓展。

首先,察其释难,似略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明清吴语小说中难词的阐释。由于受吴语词的地域性、吴语作品年代久远,尤其是某些词晦涩难懂之限,目前虽已出版了《吴语方言词典》《明清吴语方言词典》,也难免百密一疏,或不乏释义不当之处。

作者对明清吴语小说中经常出现的,而且现在仍是吴地农村常用的难懂吴词,诸如,“壁脚”、“响觉”、“响咯”、“收成”等义项,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一一加以梳理,给予合理解释。

另一类是限于明清作品的作者籍贯、生活区域等因素,诸如《醒梦骈言》中某些词语吴地特征不明显,尚未进入研究者视线,使后人很难从此书中拈出吴语,或错误拈出。褚先生认为,虽然此书与《金瓶梅词话》相比,体量较小,且为短篇小说,但只要把握住吴语的基本特征,仍不难从中恰当拈出。他分别从语音、词汇、排印本径改等角度,以十多个词语为例逐个进行分析,如从语音特征角度,对“伸拳勒臂”和“抢拳勒臂”、“拓”、“归”等词语进行吴语属性的分析。又如,通过对《醒梦骈言》中“掬木梢”、“一勒”、“反叉”等十多个词语进行吴语属性的分析等,从而推出此书作者不可能是蒲松龄的结论。

其次,察其纠误。也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对明清作品的注释之误的纠正。比较典型的是对由冯梦龙搜集、编纂的《桂枝儿》和《山歌》等书的注解。这些作品大多采自民间“矢口成言”,冯梦龙则以“从俗谈”的原则记录下来,这就导致几百年前吴地可能人人都理解的词语、句子,今人感到难读难懂,甚至无从理解。由此,对这些书作注是必要的。然而,他发现《冯梦龙民歌三种注解》一书错误甚多,甚至比不注更糟糕,有大量不明词意乱注,该注的却不注。

另一类是当代对某些“老底子”沿用吴语变异的纠误。如,长期沿用的“弹街路”,上海一些媒体对之读音虽不变,但写成“弹格路”“弹砾路”。褚先生引经据典阐明了“弹街路”来源、本意,并强调此词已收入《上海方言词典》和《吴语方言词典》,严肃地批评如此“替代”的危害性。

第三,察其拓展。褚先生在吴语

方言研究的拓展上做了不少有益工作,概括而言,一是探索吴语的规范性。他认为,上海自建县以来就有700多年历史,前人留下了数不清的吴(沪)语文本、用词规范,我们当好好用之,不可随意变异。二是针对当前上海方言使用中出现的诸多乱象,他提出学用上海闲话“应朝前多走几步或一步,不能仅停留在会讲这一层面上(即使会讲也还充满着变数)”的主张,建议“应在掌握更多的方言词汇上下功夫”,多读些书,“可以是理论方面的,可以是明清、民国以来的其他沪(吴)语文献,包括当年轰动上海滩的社会小说、言情小说,以及评弹、沪剧剧本等”,熟悉基本情况,这样利于提高规范使用吴语、上海方言的能力和水平。

作者不仅在吴语、上海闲话的研究上有诸多贡献(著有《莘庄方言》《上海西南方言词典》《明清文学中的吴语词语研究》等),而且在与之相联系的“纹圈房子”的研究和村镇志编撰方面

作出了重要贡献,是他第一个提出纹圈房子并把它记入上海地方志,明确指出纹圈房子与石库门同为上海主要居民住宅,是他开创了编撰村志的先例,出版了全国第一部以自然村为记述范围的《褚家塘志》。

据上可知,褚半农先生在吴语研究上确实是花了功夫的。古人云“山成由一篑,崇积始微尘”,褚先生在吴语研究上之所以有如此丰硕的成果,愚以为是基于如下几点:本身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自幼受吴语熏陶;生性聪慧好学,爱记日记,爱购书读书,勤思索;具有吃苦耐劳、矢志不渝、奋发图强的品格。

吴语源远流长,古往今来,它流淌在几千万人的血液中,是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工具,反映了吴语地区生产、生活和风俗习惯,对社会经济发展正在产生并将继续产生巨大的作用。这就是头上没有显赫职称光环的褚半农先生和他的吴语研究的社会价值所在。今天,吴语和上海闲话有弱化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加强吴语的研究,大力推进吴语的使用就显得更为迫切和重要。